

学林

◀ (上接5版)

由于清朝账面的财政收入有限，而商股又难以到位，政府往往通过借外债的方式修路。有着各国政府的支持，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介入，借款给中国；与此同时，他们提出了诸多的附加条件，确保借款能得到偿还，例如中方在购买原材料、聘用工程师和管理铁路的问题上，都要听他们的意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挪用铁路款并不容易。说慈禧挪用了3000万两白银，实在是高估了她的本事。

至于昭信股票，是清朝在1898年春仿照外国公债模式而发行的国债。原计划筹集1亿两白银，后来因为信用未孚，购买者不多而变成了变相摊派，终因扰民而叫停。所筹的资金约为1000万两，但截止到戊戌政变，这些筹款只是数字的汇报，还没来得及解运进京，如何用来修筑“天津行宫”？

外国公使是去过颐和园的，知道颐和园的规模，作为头号的海军强国，英国人也必然了解海军建设的成本；铁路借款和修筑，英国人一直都积极参与其间；昭信股票的发行模式，正是从英商汇丰银行那儿学来的，成败得失，英国人也自有判断。且不说康有为的说法有几成依据，即便全都属实，动用国帑又与英国何干，又如何能让英国有所动容？

书信里面唯一能打动英国人的，大概就是国际形势的分析。康有为说，慈禧太后“惟思求庇强邻，举国以托”，毫无疑问，他说的这个强邻是俄国。当时，英俄确实在全球展开竞争，英国租借威海卫，与日本走近，也正因为此事。但英国人并不认为戊戌政变与英俄竞争有密切的关联，自然也不会为此贸然行动，阻断政变背后并不存在的俄国之手。

纵观全信内容，可谓声情并茂、义正辞严，但仔细追究，却很难寻出几句真话。英国外交官当然不会没有判断。奕訢在10月13日给外交大臣的信中提到，康有为及其同党的“不智行为”致使改革失败。变法能引发外人的道义支持，弱势方的合理主张也能引发旁观者的同理心，但康有为的信口开河却透支了变法的正义性。

照会中的漏洞

与信函同时发出的康有为致奕訢照会，现如今的编号是FO 233/122/37。黄彰健先生在征引这件照会时，不能肯定它是否交到了英国公使手中。档案中的这一原件告诉我们，照会确实

送到了英国使馆，并且与信函一样，都被翻译成了英文，供使馆参阅。按理说，英国使馆在收到中方照会之后，会给出复照，也会定期打包归入照会集；唯独这个照会是单列的，不在中英照会集中，显示着它的特殊性。从外形上看，康有为照会是一个像奏摺形制的折叠文书，在照会中间和落款处，盖有关防。这个照会和总理衙门平日发给英国公使馆的照会在语言上、格式上有着较大差异。康有为是钦定的总理衙门章京，却因嫌官小而从未到东堂子胡同上班，否则在总理衙门历练两天，也不至于写出这种不合规制的照会。

这份发给奕訢的照会，开头是“大清国钦差督办官报事工部主事康为照会事”，盖用“钦命督办官报局之关防”。这个头衔有着特殊的由来。

1898年7月26日，光绪帝的师傅、改革派人士孙家鼐上奏，将上海的《时务报》改为官报，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。康有为及其党人原本是想改《时务报》为官报，在北京设本部，上海设分局，派梁启超进行管理，负责筛选信息进呈御览，把控光绪帝的信息渠道，进而影响皇帝的日常判断，并借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。

孙家鼐怎么会容忍这个计划得逞？他回复皇帝，主张由京师大学堂负责呈览全国报刊，派康有为赴上海办理《时务报》。这个方案得到光绪帝的批准，不但打乱了康党的计划，还顺势将康有为支出了北京，以减少他的政治影响力。当然，康有为随后寻找借口，滞留不走，这才有后来敦促他离京的所谓“密诏”。从那时起，康有为就戴上了“钦差办理官报事”的头衔。但问题是，照会上盖用的钦差关防十分奇特。按照清朝制度，“钦差四品以下官员关防，清汉文钟鼎篆，长三寸，阔一寸九分”，而康有为的这枚关防，边框太细，篆文十分粗糙，且长宽比严重失调，与同级别制式关防的质量相差甚远。基本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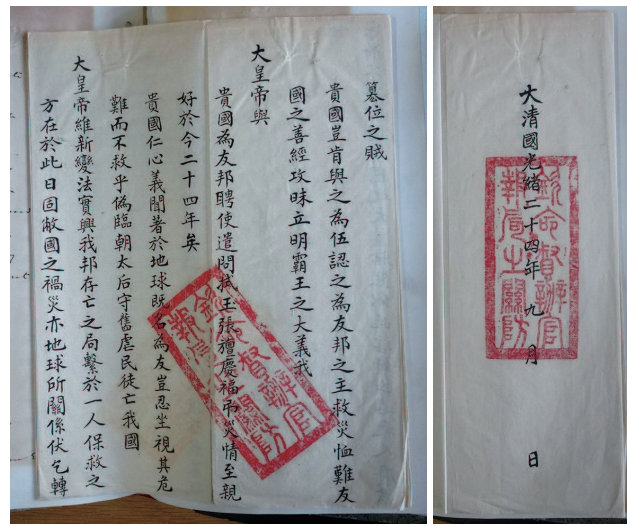
判定，这枚关防并非由礼部奉旨颁发，而是由康有为自行私造。

照会之所以被历史学家所重视，主要因为其中引用了两个“密诏”的全文，一个是让康有为与军机四章京商议解救皇帝的对策，一个是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，多加保重以图他日。同样的照会，康有为还给日本驻华使馆发了一份。史学家们已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辨析，下文仅就照会中与书信相关的内容说一些自己的想法。

9月14日，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人矛盾已经比较大了。光绪帝受到太后的严厉指责和警告，说他不应该草率地撤掉礼部的六位部长，警告他别想骤进新人、设“懋勤殿”之类的议政机构。早已阴云沉沉的母子关系愈发紧张。第二天，光绪帝给自己信任的军机章京杨锐下了一道朱笔上谕，上谕说：“今朕问汝，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强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？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，密缮封奏，由军机大臣代递，候朕熟思，再行办理。”

这个密诏，被康有为进行了改易，此后多次对外暴露，即所谓的第一道密诏。他对外公示的版本各有差异，但共同点是康有为变成了受诏之人。例如，英国公使馆收到康的照会引用密诏说：“朕维时局艰难，非变用西法不能救中国，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，太后不以为然，朕屡次几谏，太后更怒。今朕位几不保，汝可与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，设法相救。”在这里，受诏人杨锐降格为排名第四的“同志”，康有为则突然冒出，成为最受信任的承旨之人。

光绪帝的本意是让军机四章京和“诸同志”拿出对策，要能继续改革同时又缓和与太后的关系，写好之后交军机大臣递上来；但杨锐传旨之后，康党想出



康有为的关防

本文图片均作者提供

的却是十分极端的方式，也就是杀荣禄、围颐和园劫后。谭嗣同带着这个方案去见袁世凯，劝他照此执行。袁世凯得知细节，吓得不敢，但表面上仍以虚词稳住了谭嗣同。待到慈禧太后听从杨崇伊等人的建议，回宫宣布训政，政变发生；继而袁世凯所密告的惊天消息被她得知，成为政变加剧、惩戒升级的重要推手。按照光绪帝原意，绝不会答应这种方案，否则，他怎能让这一群人掉脑袋的事情去走“由军机大臣代递”的路径，唯恐别人不知？经由康有为加工的密诏，把“代递”一句也给删了。

第一道密诏的再加工，让我们见识到了康有为的文字手段：将真正的受诏人由第二人称变第三人称，他自己突然冒出，升级为接受托命之人；删掉光绪帝交代的呈递方式，让旁人或后人误以为杀荣禄、围园劫后的系列谋划有光绪帝的背书。两版本的字句变动并不多，核心的实质却已被偷梁换柱。

我们进而再看第二道密诏，也就是光绪帝催促康有为离京的诏书。一直以来，它被康党称为“衣带诏”，康有为以它来自证身份，后来更是用作道具，在海外宣传“保皇”、筹集资金。但是，这个诏书从公示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怀疑。

1898年7月下旬，康有为为接到上谕命他前往上海办理官报，这是孙家鼐的策略。直到9月中旬，康有为一直滞留北京不走。此事被人告发，才有了光绪帝9月17日的再一次下旨。但这个旨意，属于内阁明发，而非密诏，明发上谕说：“工部主事康有为，前命其督办官报局，此时闻尚未出京，实堪诧异”，“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，毋得迁延观望”。然而，康有为在给英日公使的照会中并未引用这道上谕，他转述说，自己当天收到了皇帝的“朱笔密谕”：“朕今命汝督办官报，实有不得已之苦衷”，“汝可迅速出外，万勿延迟，汝一片忠爱热肠，朕所深悉，其爱惜

身体，善自调摄，将来更效驰驱，共建大业，朕有厚望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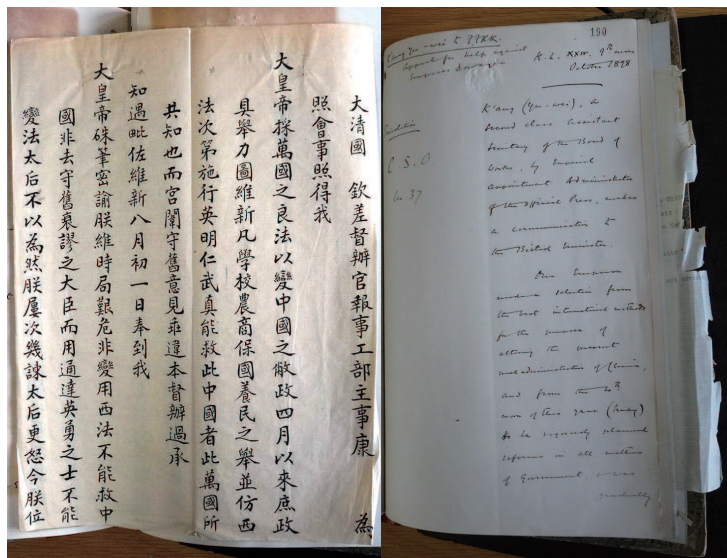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道上谕，存在巨大的差异。那么，康有为转述的朱笔密谕，是如前一天那样对原诏进行的加工，还是他真的收到过林旭带出的“密诏”，似乎不太好判断。问题是，康从未出示密诏的原件，除了康党一党，也并无旁人印证这一密诏的存在。结合他对前一份诏书偷梁换柱的动作，我们有理由推测，他很有可能是在作伪。

与光绪帝频繁接触的张荫桓深受皇帝信任，他的日记对皇帝语言的还原度极高。通过张荫桓戊戌年的记录，我们可以发现该时间段光绪帝语言的一个细节：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更习惯用“尔”、“尔们”作为第二人称（偶尔用“汝”），尤其是在命令或陈述语气中。在9月15日的密诏中，光绪帝给杨锐的原话是“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密筹”，康有为改窜为“汝可与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”；同样地，康有为在各处公开第二道密诏时，反复说“朕命汝督办官报”、“汝可迅速出外”、“汝一片忠爱热肠”，以示皇帝与他的亲密关系。但是，这实在有点用力过猛，不但出卖了自产自销的密诏，也暴露了他与皇帝接触有限、不太了解对方语言特点的事实。

避难香港的康有为给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发了书信和照会，也给日本使馆发了同样的照会。他篡改了“圣君”的密诏，生造了天子的嘱托，痛斥太后“渎乱凶淫”，他还极力地向外展示着自己作为改革领袖和托命心腹的形象。只不过，他的奏庭之哭并没有奏效。英国人有着繁密的情报网络，也有着清醒的判断，他们说：“中国正当的变法，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。”

捏造谎言去打击敌人，这岂不是自毁信誉、拆了自家的台？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)



康有为致奕訢照会及英文对译件